

谈毛传解说诗句(一)

萧 璋

关于《诗经》章句的划分，我们知道春秋时代已经有了。非但划分出章句，单字的训诂、整句的解释，在春秋战国的古籍中，也屡见不鲜。可以说《诗经》章句之学已粗具于先秦^①。不过我们所碰到的都是散见于群书之中者，一鳞半爪，究非全豹。如果作为《诗经》章句全部来说，今天传下来的，要算毛诗最古。毛传释诗，方面很多，诗句的解说是其重要方面之一，值得研究。要想全面深入地研究毛传，首先就应该理解清楚孟子说诗的几句名言：“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因为一方面这是一般都承认的读诗的原则，离开这个原则，就得不到诗意；另一方面研究毛诗的又认为毛传恰恰最能体现这个原则。因此，如果原则搞不清楚，就必然影响对毛传的理解，以至歪曲诗意。反之，原则搞清楚了，对毛传就能知其所以然，特别是在解说诗句方面，如何具体体现原则，采用什么方法等问题就自然可以得到解决，从而加深了对诗意的理解。

—

这个说诗原则是孟子回答他的弟子咸邱蒙问《北山》诗的问题以后总结出来的。《孟子·万章》：

咸邱蒙曰：“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从这段对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回答咸邱蒙，首先根据《北山》诗的序文（即主题）^②把对方的话全面否定，然后根据主题思想具体纠正咸邱蒙对诗句的误解，跟着作出四句总结。这就告诉我们，孟子说诗非常重视诗的主题思想。他认为诗的主题思想体现了诗人之志，或者蕴涵着诗人之志。如果要了解诗意，必须把全诗的词句与主题思想紧密结合，揣摩其意，灵活解释，否则就会犯如孟子批评他的学生高子治诗所犯的毛病——“固”^③。

（“固”就是死于字下，不能贯通。）说诗“固”了，就会害辞害志。这是我们对孟子说诗原则总的理解。

如果仔细玩味这段话，还可以了解得更具体。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文”就是字（从音义角度说就是“词”）指“体”。“辞”是字（或词）组成的句、章、篇，也包括词组，（一般指双字组成），甚至单字，指“用”。这两句是一气贯下来的，大致是说不要拘守字意而伤害了句意以至整个诗意。孟子感到“莫非王臣”的“王臣”，咸邱蒙不顾诗的主题思想，固执着一“王臣”理应为一般的解释“王之臣”的观点以解诗句，因而有“瞽瞍之非臣，如何”之问，是以文害了辞，因而害了志，而他自己则认为这个“臣”应该结合《北山》诗序文理解为“王事”，就不害辞害志。他还连及咸邱蒙没有问的另一句——“我从事独贤”。这句诗的“贤”，他不固执着一般所谓“贤才”讲，而结合诗序解为“贤劳”，也不害辞害志，得到了诗意。

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四句原则性的话了。“以文害辞，以辞害志”是孟子否定的一面，“以意逆志”是孟子肯定的一面，二者相反相成。所谓“以意逆志”，是说在解诗时，要自

已用心领会诗的主题思想（即诗序），揣摩诗本身的内容，在这个基础上来解释诗的具体词句。这样才能得到诗意。孟子之所以解“王臣”为“王事”，解“贤”为“贤劳”，正是由于一方面领会“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这个主题思想而得到启发；另一方面又结合本诗的上下文意，如“王事傍傍”、“经营四方”、“或尽瘁事国”、“或惨惨劬劳”等诗句而更加豁然。我们可以说孟子在这方面为后人作出了示范。

还要补充两点：第一点，孟子说诗所以特别重视诗序，是和他颂诗读书，知人论世之说分不开^④。诗业有师传，诗序渊源甚古^⑤，自足征信。第二点，孟子解词，虽然灵活不固，但不失语言规律。他解释“王臣”为“王事”，固然有诗序和诗文作根据，可是用“王臣”表示“王臣之事”也合古汉语习惯^⑥。解“贤劳”，自亦受序文和诗文的启发，但“贤”与“劳”义实相因^⑦，不失古人用字法则。

原则既然弄清楚了，就可以接着讨论毛传解说诗句的问题了。为了把问题谈细致些，我们准备先就毛传在紧密结合诗序问题上举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来研究，然后再就毛传如何解释诗文双字和诗文全句这方面（包括篇、章）分别叙述。

《卫风·淇奥》：

诗序：“《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

正文首章：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毛传：“兴也。奥，隈也。绿，王刍也。竹，篇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质美德盛，有康叔之余烈”。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传：“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学而成也。听其规谏以自修，如玉石之见琢磨也”。

拿毛传和序文一比，就知道凡是序文提到的，毛传都结合解诗以作呼应。譬如序文说：“《淇奥》，美武公之德也”。这是《淇奥》诗总的主题思想。全诗三章中的每章首两句，大体相同，都是用淇水涯内所生的王刍与篇竹两种植物因得淇水浸润而茂盛的情况来起兴，暗示卫武公之所以德盛也是有所凭借。序文仅言武公有德，未说德盛之故，兴意不明。毛传说：“武公质美德盛，有康叔之余烈”，则点出原因，兴意显著。序文中“美武公之德也”以下又分几层进行了补充说明：“有文章”是一层，“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是一层，“故能入相于周”是一层。对此，毛传于首章“有匪君子”三句之下也作了与之相应的解释。序言“有文章”，传则辅以“道其学而成也”之句，并训“匪”为文章貌。序言“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传则辅以“听其规谏以自修，如玉石之见琢磨也”之语。序言“故能入相于周”，传则云：“重较，卿士之车”，谓武公入相平王为周之卿士。传与序这样彼此呼应，相得益彰，自然收到知人论世以说诗，诗意因而显著之效。

再举《豳风·狼跋》：

诗序：“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圣也”。

这篇诗的毛传也和序文配合得比较紧密，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据序文，这篇诗是歌颂周公摄政，处境困难，而不失其明智。但诗是兴体，用“狼跋其胡，载橐其尾”两句来比喻周公所处的困难境遇。这个比喻怎样和诗序联系起来呢？毛传则说：“老狼有胡，进则躐其胡，退则跲其尾。进退有难，然而不失其猛”。这就暗示出周公摄政时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往无前，继续摄政吧，则四国既都散布流言，成王又不谅解，阻力甚大，知难而退，不事朝政吧，又怕政权旁落，危及周室，不能坐视不问。仅管如此，与老狼虽在进躐胡，退跲尾的困境中，仍然勇猛前进一样，周公

也不顾困难，坚持摄政，直到成王长大，授位成王而后已。毛传对诗序既有补充，又有解释。诗序只说周公进而问政难，毛传则根据诗文，暗示出周公退而不问也难。诗序只说周公不失其明智，没有说出明智之所在，而毛传则根据诗文暗示出周公知难而进并终于等到了成王长大，使他居了天子之位，说明周公明智之所在，就在于此。这样就起了诗与序之间的桥梁作用，诗意因亦大明。

传与序配合得这样紧密，虽然在毛传中不太多，却可以看出毛传解诗之如何重视序文，如何体现知人论世的精神。当然，毛传不仅重视诗序，其解诗亦如孟子之能结合经文整体，又不违反语言规律。

注：

①《左传》每言“赋某诗之某章”，而《左传·定公十年》：“臣之业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按《扬水》即《唐风·扬之水》。该诗凡三章。一二两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此言卒章之四言，四言当是四句之意。余参看拙著《毛传条例探原》（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训诂研究》第一辑）。

②《小雅·北山》序：“《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

③《孟子·告子》：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已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④《孟子·万章》：“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⑤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于《关雎序》“《关雎》，后妃之德也”下说：“沈重云：‘按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

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实则《诗序》渊源甚古。譬如《论语·八佾》云：“《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陈奂《诗毛氏传疏》以为“孔子论诗释《关雎》之义，而子夏作序之所本”，其说甚是。还可以再往前推。春秋时说诗，已及《诗序》。如《左传·襄公四年》鲁国卿士叔孙穆子说《四牡》诗，言：“《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国语·鲁语》作“《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意思差不多，而今本《毛诗·四牡序》作“《四牡》，劳使臣之来也。有功而见知则说矣”，即本《左传》而略有增补。

⑥譬如《周颂·噫嘻》：“噫嘻成王”。毛传：“成王，成是王事也”。“王”表示“王事”。又如《周颂·执竞》：“自彼成康”。毛传：“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成康”表示“成安（康）之道”。用语法术语来说，都是以某定语代表以某定语及其所修饰之成份（未标出）合成的整体，这是古代汉语常见的现象。

⑦“贤”古含有“敬”义。《国语·晋语》载晋臼季向晋文公推荐冀缺说：“臣得贤人，敢以告”。文公向臼季说：“子何以知其贤也”？臼季回答说：“臣见其不忘敬也”。是其证。“贤”和“敬”都和“坚持”、“振作”之义很相近。比如《礼记·礼运》：“礼义以为纪……以贤勇知（智），以功为已”。这个“贤”用作动词，就有振作之义。全句是说用纲纪迫使智者勇者振作起来给自己立功劳，所以《大雅·行苇》五章言“序宾以贤”，而六章则言“序宾以不侮”。“贤”与“不侮”义近，所以六章毛传说：“言其皆有贤才也”，实际是以“贤”释“不侮”。而郑笺则说：“不侮者，敬也”。于事坚持、振作则劳累，两者是因果关系，所以孟子以“贤劳”训“贤”，《北山》诗毛传也用“芳”解“贤”。

（待续）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